■宁夏革命英烈■

李仰南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（下）

邢万莹

争取团结进步人士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李仰南及工委其他成员，利用1937年秋张子华回宁时同袁金章、高立天等人秘密建立的统战关系，分头到省城、银南、银北等地进行联系。争取团结了袁金章、雷启霖、王振刚、李冲和等一批中上层人士和教育界师生以及商人中的同情、支持者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。同时，通过这些代表人物，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，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，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，支持了党的工作。

发展一批共产党员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。李仰南及工委其他成员，通过实际工作的考察了解，先后在宁夏各地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，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。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下属5个支部，32名党员。

动员选送30余名进步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，在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。他们毕业后，有的参加了八路军，有的做地方工作，有的又于1939年派回宁夏参加地下工作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。

开展兵运工作。李仰南来宁夏前，党组织交给了他在宁夏马鸿逵部队的几个关系：一是驻石嘴山的马英才旅部副官苗培植，一是驻宁夏新城某旅参谋。李仰南到宁夏后，先与苗培植取得联系，然后通过苗培植把1937年12月从边区派来的中共党员李维钧安排在该旅五团三营八连，以当司书为掩护做兵运工作。李仰南根据上级指示，给李维钧布置任务：不在友军中建立党的组织，不拉队伍，主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通过朋友讲形势，开展抗日宣传等方式，提高友军官兵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，使他们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，自觉抵制和反对马鸿逵对日寇的妥协活动。1938年春，当李仰南得知1936年11月红二、四方面军经过宁夏向陕北转移时，四方面军曾有一部分人员被俘，在马鸿逵工兵营做苦工的消息后，提交工委研究，决定设法同这部分人取得联系，使之成为建立武装的骨干。李仰南派中共党员肖子珍开展此工作，很快与工兵营一位四川籍女同志取得了联系，开展了对被俘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工作。后因马鸿逵对部队统治很严，收效不大。

1938年秋季起，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，国民党宁夏当局防共、反共活动逐步升级，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处境困难。马鸿逵下令取缔抗日团体，追捕共产党人，李仰南等人被曾经混入三边的马鸿逵部特务马子成发现，难以立足。李仰南觉得自己不宜继续在宁夏工作，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。同时，不顾个人安危，继续留下来，化装成商人，改名杨维宝，秘密进行工作，机智地保护被敌追捕的党内外同志撤离宁夏，使所有在宁夏的中共党员没有一个遭敌逮捕。1939年10月，中共中央讨论了宁夏工作问题，并决定派崔景岳来宁夏接替李仰南，建立新的中共宁夏工委。12月下旬，李仰南与崔景岳在中宁“协记号”商店接头。然后一起到各地交接工作。崔景岳接任工委书记。1940年春节过后，李仰南回到延安。

1940年春，李仰南在中组部招待所候职，并对中共宁夏工委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。同年冬，参加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央党校组织的《抗战中甘宁青党的工作》一书的编写工作。

1941年春，李仰南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班主任、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少数民族组干事。1942年夏，任中共甘宁工委委员、宁夏工作部部长。9月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仰南1931年被捕问题再次进行审查。当时，原和李仰南在山西第一监狱和反省院的大部分同志都已到延安，提供了确实可靠的证明材料。经审查，根据《关于履行手续处理办法》决定，恢复了他1929年党籍。同年冬，又被调往环县县委任统战部长。1943年夏，调回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。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胜利，李仰南随中央党校干部大队赴东北工作，先后任中共黑龙江省通北县委书记、黑龙江赴光农场场长、辽宁本溪煤铁公司人事处处长等职。1950年10月，参加抗美援朝，任志愿军后勤五分部政治部干部科长，1953年秋，回国后又先后任长春六三六厂副厂长、沈阳俄文学校校长、沈阳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副校长、沈阳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，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。1973年6月，因病休养。1984年，病逝于沈阳，享年73岁。

宁夏党史大事记（二十六）

邢万莹

1944年11月	宁夏籍学生关立信、温积成、刘廷栋等10余人在兰州成立“建宁学会”，并创办《夏声》刊物，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。
1944年11月	红井子工作据点派马少林回家乡金积一带活动，担任交通联络工作，并对马鸿宾部八十一军中宁县南营房驻军进行策反。
1944年11月	中共三边地委保安处决定派外勤人员何述田前往中宁县，做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需官李振邦的工作，并将其发展为中共党员，为党组织收集情报，开展党的工作。
1945年3月	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河东工作组，组长赵文献，副组长梁大均，成员何广宽，统一领导余庄子、红井子、三段地等据点的工作，并明确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是：“以建党为主，走农村路线，深入下层，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。同时，不放弃任何有机会的统战工作。”
1945年12月	八路军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派中共党员马绍常（系马鸿逵同乡、原在马鸿逵部工作）持贺龙、高岗的信件，赴宁夏省城与马鸿逵谈判，向马鸿逵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和平民主、团结统一的国家和决不打内战的主张，以求谅解，互不侵犯。马鸿逵对这次谈判持积极态度。
1945年12月	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召开盐池县委、河东工作组全体人员会议，就如何开展宁夏工作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。会议确定主要在工人和农民中大力发展党员，重视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；领导工厂、农村群众的自发斗争；把建党工作同群众的自发斗争结合起来。同时，还要重视和加强中层统战工作。会后，磁窑堡、石沟驿的煤矿工人，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。

（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，中共党史专家）

红军在宁夏留下的标语

1936年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曾经过宁夏，播撒革命火种，并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标语。如今，这些红军标语作为历史见证，已成为宁夏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，是大力弘扬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革命精神的宝贵财富。

1935年10月，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宁夏翻越了六盘山，胜利抵达陕北。在长征途中，如毛泽东所说：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他们在宁夏宣传群众，播种革命，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民族政策，得到了宁夏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。

1936年5月18日，党中央发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，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，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，率领1.7万余人，分左、中、右三路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军。

为争取各族群众的拥护与支持，红军大力开展宣传工作，利用标语、口号、讲演、座谈等形式，宣传红军的宗旨，传播革命思想，宣布红军尊重回民政策，而书写标语则是红军手中最为常用和有效的一种宣传方式。

豫旺堡城隍庙红军标语

豫旺堡今为同心县豫旺镇。豫旺堡城隍庙，当年曾为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。该庙前后两座正殿，东西两座侧殿，两个角楼，除西角楼外，四殿及东角楼墙壁上均有红军留下的标语，总数60多处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“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，欢迎回民群众来当红军，欢迎回民官兵们到红军中来”

“我们是要打日本帝国注意（主义）！”

“抗日的国民革命军不该进攻抗日红军！”

“联俄联共一致抗日！”

“反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帮助日本！”

下马关镇红军标语

同心下马关镇旧时为豫旺县城，红军标语写在一处民房内，内容如下：

“欢迎二、四方面军北上！”

“欢迎白军同红军一致北上抗日”

“欢迎两广出兵”

“反对蒋介石阻碍两广北上抗日！”

“中央第一师南下是阻碍两广北上抗日”

“反对中央第一师胡宗南南下”

“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，西北一切不想当亡国（奴）的人民同红军一路北上抗日去！”

“打蒋贼救西北，打日本救中国，打土豪救穷人”

“巩固老苏区，发展新苏区，活捉马洪魁（鸿逵），打到宁夏去”

杨家堡子红军墙报标语

杨家堡子位于今同心县马高庄乡沟滩村，旧时为土豪杨廷栋庄院。1936年西征红军解放豫旺地区后，西方野战军后勤部驻扎在此。堡内四合院上房东墙上写有《美国记者的演说词摘要》《支部工作栏》《宣传大纲》三个大幅宣传栏。

美国记者是埃德加·斯诺，演说词摘要约410余字。斯诺在豫旺为红军指战员所作的讲演中说：“诸位英勇的同志们，在你们热烈的欢迎中，我万分激动和荣幸，在你们伟大的胜利中，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很快同你们汇合了，你们的前途是无限地开展着，我今天替你们照了红军活动的照片，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，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——广大劳苦大众，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和鼓舞。”

《支部工作栏》紧靠演说词左边，上端横写“支部工作栏”，字前画有党徽，下面竖写“党的工作中心”及“八条工作要求”，最后一行写“三六年十月份上半月工作”。《宣传大纲》在最左边，面积较大，上端横写“迎接全国红军大会合”，全文竖写，约600余字。该宣传栏破损严重，一半字迹已不能辨识，从内容看应是新闻报道，述说二、四方面军进军情况，介绍全国抗日高涨情形，提出扩大红军等。

红城水娘娘庙红军标语

红城水今属同心县下马关镇。1936年，红军西征时曾在此驻扎较长时间。红军的标语写在娘娘庙墙上神像壁画的间隙处和空白处。主要内容有：

“三大（打）三救”——打倒日本救中国，打倒卖国贼救同胞，打倒土豪救穷人！

“六大要求”——坚决执行命令，动作迅速，遵守时间，整齐清洁卫生，爱护自己武器，主义（注意）提倡礼节。

红城水娘娘庙里的红军标语还有“八大注意”，只有“注意中国”“注意工农”“注意民族”可以看清，其他不可辨识。

辛庄滩雷祖庙红军标语

雷祖庙位于今同心县张家塬乡新庄滩。1936年红军西征时雷祖庙为“列宁室”，庙内东西墙壁均写有革命标语：

“联合红军打日本救中国！”

“推翻帝国主义统治”

“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”

“推翻军阀国民党政权”

“红军是抗日先锋军”

“建立国防政府”

红军还在庙内墙上写打油诗一首：“明月照天空，灯光遍地生，回汉一家人，打倒鬼子门（们）”。

祁家堡子红军标语

祁家堡子位于今海原县三河镇（原黑城镇），旧时为地主祁雨仓庄院。1936年红军西征进军固原县黑城，打开祁家堡子后，曾在此驻扎20余天，宣传标语即为当时所写：

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！

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”！

“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！”

“红军是抗日的先锋军！”

（据固原党史网）

移民岁月 第五十七期 YI MIN SUI YUE

连湖农场小学的创办人——江愉（二）

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

江愉：我们来宁夏都是自觉自愿的，是我自己争取来的，当时决心不大还不批准。也真不知道来宁夏干啥，就知道是支援边疆。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人很多，红旗招展、锣鼓喧天，充满了战士出征的神圣感。送行的领导说：盼望听到你们取得成绩的好消息。送行的朋友说：希望到那后有更好的工作。送行的父母满脸泪水讲不出话来，拉着我的手不松开。

18岁的江愉满怀激情来到宁夏。拉她们的火车是铁皮闷罐车，稻草铺地。尽管睡在稻草上，但没有阻止她对宁夏蓝天白云、牛羊成群、稻花飘香的渴望。她甚至还在幻想着，到宁夏当一名纺织女工，穿梭在织布机中，又幻想着当一名女司机，驾驶着汽车，在边疆的道路上多拉快跑。

车窗外越来越贫瘠的景象很快把她从幻想中拉到现实，列车西行中她发现，离老家越来越远、土地越来越荒凉、民众越来越穷困。

江愉：来的时候自己带的铺盖，国家给我们发了一床棉花被子、一件蓝大衣、一顶帽子、一双棉鞋。铺盖铺在地下，车箱里睡了五六十个人，旁边放了个马桶。开始大家都特别高兴，我们几个初中毕业的同学还在车上吹起口琴，一起唱《凯旋之歌》，心里特别高兴，两天后到了兰州，送上来的是从来没见过的黄米饭，车窗外的荒凉开始让我们心里发凉。这时候才知道，西北好苦啊，车一停下来，成群结队的讨饭人就围着我们转，大家把车上发的大饼子送给他们，这个时候开始有人后悔了，歌声没了，有了哭声。

满眼的荒凉、成群结队的乞丐和吃不惯的黄米饭是进入西北后给江愉的所有印象。这还不是最糟的，接下来，幻想当纺织女工、女司机的梦又破灭了。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自己从江南的工人变成了西北农场的农工。

到银川后，当地政府专门为她们送来了大米饭，饭中的沙子让她忘不掉。吃饭时她得知，连湖农场是她支边的落脚点，农场的卡车挂着横幅，很热情地欢迎她们上车。

江愉：1959年5月11日我们到达银川，吃了一顿大米饭，菜是红烧肉。连湖农场的老军工家属都穿的好漂亮的衣服、绑着红绸子、绿绸子迎接我们。地下的脸盆里装着肉和土豆，没有凳子，蹲着吃饭。住的全是窑洞，地下铺的草，长长的一排，20多人住一个窑洞，女青年好些，七八个人住一起。有人看着这样落后的条件开始后悔了，我没有反悔，我来时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我还在想，建设美丽的边疆就从脚下开始了。我们一起来的680人，最后留在宁夏的只有10多个人，绝大部分都回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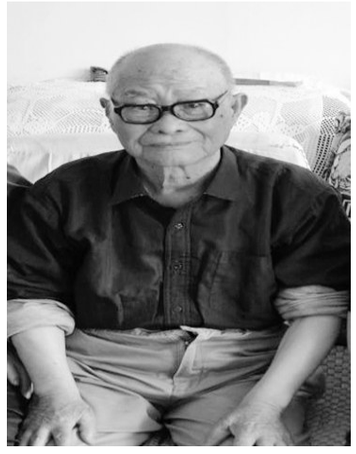
连湖农场是自治区成立后组建的，以军垦为主，与农村的区别就是上工下工要吹军号，职工称军工，工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，是换了个叫法的农民。从这天开始，她从工人变成了农民。

身份的转变让江愉吃惊，来时的幻想全部消失。为了满足自己，她和同来的老乡一起，爬上了农场新来的拖拉机上，照了张相片寄回老家。老家的父母看了照片后高兴了很长时间，到处炫耀。公社还把这张照片放到橱窗里展示，江愉的妹妹看到照片后也有了来宁夏当女拖拉机手的梦想。

（蔺银生 马君武 王旭阳 整理）

来灵武农场的第一批大学生——武建礼（二）

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



灵武农场不仅是宁夏建立农垦以来第一个国营农场，是西北农业建设重点国营农场，还是宁夏第一个机械化作业的农场，起点很高。比如，一般农场不可能设一个气象站，灵武农场很早就建设了气象站。气象站的出现与原苏联一位农业专家叫伊万诺夫有关。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，就是搞农业的，首先要走出去，把田地情况搞清楚。这个地方的最高气温、最低气温、海拔高度都要搞清楚，所以我和邢本正两个人就搞了个气象站。邢本正也是看了那个材料，对农业气象学都比较有兴趣，对我们自身探索农业科学也是一种难得的锻炼。邢本正最后调到宁夏大学外语系教书了，后来还当了系主任。其实我的英语基础还可以，读大学的时候很多书都是英文的，像遗传学、生物学、植物生理学等。没有中文的，或者是俄文的，有的也翻译成英文了。专业书用外文词典查看，阅读可以，但口语不行，基本是“哑巴”外语。苏联农业专家办农业要有气象学知识的观点就是从外文中了解到的。

武建礼：你问我的求学经历，怎么从华北跑到重庆读的西南农学院。我是河北省鹿泉区土门村人，1926年11月21日出生，今年94岁了。七七事变，抗战爆发，我7岁那年全家一路逃难，从山西娘子关、阳泉到陕西赤水镇，后又到湖北汉口。家人送我到战时儿童保育院，武汉战事吃紧又到抗战时的陪都重庆，进了一家兵工厂的子弟学校当教师，教五年级的课程。因为兵工厂付的工资比同行业的要高，觉得也挺好。但父亲劝我考大学继续深造，于是就考取了四川省国立教育学院，后来改名为重庆大学。我开始在园艺系，后来又转到农学系。

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雷大川，他是学农业机械的。他先是到中卫县农场当厂长，最后又调到西北农垦局。只有我在灵武农场一待就待了30多年，最后退二线以后调到宁夏农校教书去了。

我的老伴比我小7岁，她本是我父亲学校的一名学生，即河北怀柔中学的。因为家贫没法供她上中学，是我父亲做工作，由我用工资资助她上的中学。那个时候国营农场已实行薪津制，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工资70多块钱，我觉得工资太高了，去找场长高宜之，说我刚毕业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合适吧，人家开拖拉机的才拿40多块钱，就连队长也才拿了40多块钱，他说这是国家规定的，我们不能动，所以当时我有这个余力资助她上学。后来么，就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，这样才结的婚。我是1983年评的高级农艺师，是农业厅第一批评的高级职称。从灵武农场出来，又到农垦科研所当了3年所长，56岁以后从领导岗位上下来。当时宁夏农校非常欢迎我去教书，于是又调到农校教书，直至退休。

（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）